

概论国有企业实行资本化经营之要义

胡培兆

特性的社会主义与中性的市场经济要结合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一个磨合过程,关键是国有企业要按市场原则进行经营。只要能满足市场经营必要的条件,国有企业就铸定能经营好。只要不能满足市场经营必要的条件,就是其他方面的条件再强再硬,国有企业也铸定经营不好。

然而,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政府给的市场经营条件都不充分,效益普遍比较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市场经营条件尤不充分,效益又要差些。照理,政企合一,有政府在后台当大老板,在政策、金融、情报等方面都占有私人企业无可比拟的优势,应该经营得特别好、效益特别高才对。就是私人企业,古今中外凡占点官边走官商之道的都发大财,国有企业为何反而经营不好呢?根本问题在于经营管理体制是否顺道,即是否符合经济规律。好心办坏事,是屡见不鲜的,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营中就更是见多不怪了。谁不想经营好国有企业?往往就在这种想经营好的想法做法中无意识地损坏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做错了还不知错在哪里,甚至还觉得错就错在错得不够。譬如有些不该管的还觉得管得不够。国有企业改革中长期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困惑。国有资产实行资本化经营,给国有资本盈利所必需的各种市场经营条件,国有企业才有改革成功的希望。

一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主要有三个困难,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理解,就是同一人也有矛盾理解,有时认为应该这样理解,有时又认为应该那样理解,不是有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摆在面前就可以有统一的正确认识的。虽然最终都会统一在真理上,但统一过程往往要消磨许多岁月和时日。二是对改革方向有不同理解。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对,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对,怎么回事?疑虑不少。三是国有企业自身有不少管理上技术上的难题,社会环境也有不利的一面。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从1984年全面展开以来,已经过了整15年,比原定计划推迟了许多,至今还在艰难地继续着。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写在纸上,又不写在纸上的。写在纸上的,是因为有许多经典著作在。又不写在纸上的,是因为纸上的东西来自实践,任何经典著作中的理论都只是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客观实践的真理,并非是超越时空的天条神谕。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是生动活泼、充满朝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归根结底是写在实践上的。具体学说要依实践的变化而变化、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今天,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这场经济体制改革与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行程上有很程度的反向现象。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向是所有制结构方面由多元所有制经济转变为一元所有制经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在管理体制方面是由分散经营转变为集中统一经营,由分权到

集权。而这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反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是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所有制结构，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在管理体制方面，弱化统一集中管理，扩大地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这样就发生疑问，经济体制改革与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革究竟谁是谁非？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具体到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理解，在思想上又有障碍。实事求是地说，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太过的问题，太早太急地追求单一公有制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目标，超越了中国国情。现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全盘否定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否定太过的部分，使其回到合理点上，也就是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重构社会主义现实模式，以利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因此，不应该对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国有企业从组建到管理一直都是由国家操办的，遗留的计划体制病太重，离开襁褓就不能独立存活。改革要使其独立经营，要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效益降低，都是很自然的事。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要使国有企业进入市场极不容易。主要困难有两个，一是体制不易转换，需要摸索就难免有曲折，需要时间磨合。另一是技术设备更新没有资金积累。即使有个好体制，技术不更新也无实力进入市场竞争。因此，国有企业十多年改革不到位，效益差，是可想而知的。在体制改革的多种试验中，有这样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具体管理体制可以多样化，重在创，次为学。任何一种在个别的或少数的企业先行有效的管理办法，如果加以标准化和模式化全面推广，就可能全面失效。因为企业千千万万和千差万别，应该各有各的生存发展招数，不必强求统一。有好的经验可以报道宣传，但不宜组织推广。趋利创优，争强好胜，是经营者的本性，自己懂得取舍。而且，过去的改革措施，都局限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没有考虑外部环境，企业产品市场销售这个致命点没有予以充分考虑，企业产品没有市场吸纳，责任制、承包制再完善也无济于事。在技术改革方面，长期存在制度性滞后与障碍，很多企业都栽倒在技术改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市场竞争压力，也就没有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的紧迫感，机器设备只有自然磨损老化，没有精神磨损淘汰。因此，固定资产更新比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周期还要长，英国当时是13年左右，中国是25年，企业利润都由国家统收，用于外延扩大再生产了，企业设备大修都得申请。在设备老化，又没有积累的情况下，改革了，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叫“拨改贷”，国有企业面对陈旧设备瞠目结舌。从贷款到形成生产力，需要时间，而贷款从第一天起就得计息，负担很重。所以，不少国有企业陷落在“技术不改要死，改了早死必死”的困境。

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比原来估计的要多，难以卓见成效在所必然。

二

国有企业改革难见卓有成效，就出了一些退却理论，集中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信心不足。他们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大同理想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似乎是有史以来就是世界上的头号人口大国。人口多，社会问题就多。人口多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不是按人口的倍数同倍增加，而是双倍或多倍地增加，即人口增加一倍，社会问题可能增加二倍三倍。为什么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患贫而只患不安，不患寡而只患不均”的心态呢？就因为人口多有求生不易、求安也难的忧虑，希望有个大同社会的保障。从孔夫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到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憧憬，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孙中山的

“民生主义即是社会主义”，无不都是顺应民心的大同构想。古人前人尚能顺应民心、体恤民情，为什么今人反而要放弃社会主义大同呢？轻易否定社会主义，是对中国民心和中国历史缺乏真正深刻了解的幼稚性。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吃大锅饭，简单地均富均贫，应注重实际，能实行到哪一步就到哪一步，不可狂想超越。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12亿人口经济上的社会大保障，使人民在观念上还有个社会主义大同的存在，有事还可找人民政府。同时，更重要的也是给政府加担子，提醒政府不要忘记对人民应负的责任。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没有人民的大同理念，没有人民的政府。现在时尚制度创新，也常讲世界多极化发展。在大多数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大世界中，有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这方面就不能来个制度创新，全世界只能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呢？战后世界有今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社会主义的存在。所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不应当受到责难的。但公有制主体地位不是单靠政策维护，也不是靠简单的数量多数，主要是靠自身质量的优势，有经营活力和实力。没有这个优势是勉强不下去的。在现阶段，公有制主体部分不宜过大，战线不能太长，先积聚力量和发展优势，再徐图扩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现阶段公有与私有的经济共同发展的最佳经济生态。有公有私，可以互相激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可以保障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组织和集中控制力消弭经济大震荡的端倪，给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其他经济成份的发展，可以减轻国家经济行为的负担，让国家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办好一些必须办的企业和基础设施，又保障市场供给，提供和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品，同时可以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消化国有企业的部分困难，如吸纳下岗工人等。经济群体共生态，是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共有的和必需的。无论哪个社会形态，都是以主体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共生态，这是客观规律。

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转向资本经营。社会主义之所以还需要资本经营，是因为资本不是别的，它是发达商品经济的范畴。凡要实行发达商品经济的，就非得采取资本经营不可。关于社会主义国有资本的理由，已有不少文章论述。他们大凡都从资本的共性或中性出发来论证资本在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性。这种论证方法其实是非常牵强的，令人有概念化、随心所欲套解之嫌，凡需要什么，就共性化或中性化什么，文字技术上处理后突破社会制度界限即可。资本诚然是共性或中性的经济范畴，但论证则不应以共性谈共性，或以中性谈中性，讲共性或中性之前先要有许多或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个性存在。在所论资本的共性或中性时，就得先有资本主义资本与社会主义资本的存在，然后再从它们那里找出共性或中性来。这才符合逻辑思维的规律。社会主义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原来并不容许存在。在没有社会主义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哪来资本的共性或中性？单从资本主义资本中能“抽象”出社会主义也有的资本共性或中性来？先从资本主义资本的单个存在“抽象”出资本的共性或中性来，再谈资本范畴也适用社会主义，这是悖理的。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告诉我们，资本是发达商品经济的范畴。马克思当时把商品生产分为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简单商品是以使用价值生产为目的的，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以价值生产具体说是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货币成为增殖手段。当货币为增殖目的用来购买劳动力时，货币就转化为资本。作为资本的货币，除了执行货币的一般职能之外，还有增殖职能。只有资本出现，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强加于整个社会”，“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才能

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马克思语）。所以，只有资本出现，商品生产才能高度发达起来。社会主义要实行的商品生产是简单商品生产（W—G—W），还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G—W—G）？1984年就确定社会主义要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不利用资本范畴行吗？有一个事实不能回避。过去我们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却缺乏使用价值，供应紧张，市场匮乏，资本主义国家为价值而生产，却有丰富的使用价值，处处是买方市场。这是为什么？资本范畴起了作用，为了追求利润，竭力为市场而生产。社会主义如果继续舍弃资本范畴的作用，就等于仍然把商品生产限制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不可能充分发展起来，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便是社会主义需要资本存在的根子。资本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资本自身没有气味，无所谓善恶，只有当它和特定的“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个性问题。

国有资本有多种实现形式。实现的含义只有一个，就是增殖。市场是一切企业经营成败的关口，能否进入市场取得经营效益，最终实现增殖，是企业的生命线。国有资本要过好这一关，就只能采取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形式。不论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内部改革，还是国有企业之间兼并组合的外部改革，实质上都是国有资本以盈利为目的的实现形式的改革。这里需要区分资本增殖与增值。增殖是资本的生产力，要生出盈利来。增值是扩大资本的生产力，将一部分盈利转化为资本即积累。同时要区分保值和增值。保值是承租者或经营者的责任，增值是出租者或所有者的责任。这同土地出租经营是一样的。承租的经营者只有义务保护土地原有的面积和肥力，但没有责任要扩大土地面积和增加肥力，要扩大和增加是土地所有的责任。国有资本的经营者要保值增值要上缴税利，负担太重。要增值，就必须酌情减税，因为增值也是国家的，无异缴税。现在理论界不重视增殖与增值、保值与增值的区分，容易在实践上造成责任不明，苦乐不均。兼并和组建企业集团属资本集中。资本集中有三条途径，一条是强制道路，大引小，强吃弱；一条是平滑道路，用股份制吸引资本；一条是强强联合道路，大公司与大公司合并联手。中国这几年的兼并缺乏自然感。有明显的强帮弱、富扶贫的行政性捏合迹象，可能导致强者弱化、富者贫化。按中国现阶段的企业水平，普遍地浪潮般地组建集团的时机未成熟。重要的是要创造资本集中的市场条件生成，培养强势企业崛起，尊重自然，促进自然。兼并组合中对国有资本的流失要具体分析。要区别合理的正常流失和不合理的非正常流失。笼统讲流失，不利资本流动与组合。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是对公有制理论的一种发展与完善。现在的焦点是股份制试行中长期存在严重扭曲形成的极不规范的局面。必须端正股风，检讨过去，走出陷阱。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诚然不能说“一股就灵”，但也不能说“一股就是不灵”。灵与不灵，应该是灵的多，不灵的少，不然就不会提倡。灵与不灵，一个很大因素是人为的正与邪。正则灵，邪则不灵。遗憾的是现在仍有在挖陷阱的。对上市公司并没有按《公司法》严格审核，人情因素还在起作用。

国有资产实行资本化经营，就要解决企业领导班子（这是习惯称谓，本不该再称“领导”）的工作重点放在哪的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存在市场问题，而经济短缺又是市场的基本状态，只要政治条件好，谁都可以轻松当厂领导，加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需要，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领导的眼睛都盯在权点上，管理体制成了权力配置体制，厂长和书记的关系是平衡轴心，厂长权力大了，书记有意见，说体现不了党委领导，书记权力

大了，厂长有意见，觉得无所事事，形同摆设。变来变去，以权为中心，权利纠纷也就多，不团结。实行资本经营以后，企业管理的观念要转变，把眼光从权点上转移到盈利点上来，以此论功过是非。国有资本是全国人民共有的血本，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石，能否增殖带来盈利和积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投资就要千方百计赚钱。若投资如同付诸东流，不如干脆分资到户让大家饱餐一顿，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种局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了，经营方式也要多样化，来个大解放。有关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国有资本盈利，而是要保护其盈利。所以，有关企业的立法，千法万法只要一个法，就是能使国有资本盈利的法。至今在经济方式和手段上对国有企业的限制还是多了些，以至把一些赚钱机会拱手让给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资本没有盈利就等于没有生产力，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亏损也不是社会主义。

国有资本为了有市场有盈利，就得优化自身供给，扩大市场需求。在实行计划经济时，市场供给的主要矛盾是产品数量少，不敷需求，品质不成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时，市场供给的主要矛盾是产品的品质差，不合需求，数量不成问题。现在经济不十分景气，市场显得有些疲软，主要原因是有效供给不足。萨伊认为供给与需求一致，不存在销不出去的问题，是错误的。凯恩斯认为供给过剩主要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同样是错误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不能以呆滞的目光固执一端犯形而上学的错误。需求存在有效需求与无效需求问题，供给也存在有效供给与无效供给问题，那种认为市场的供给都是有效供给，对市场疲软不要负任何责任，是片面的。不论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根本解决的出路首先在供给。凯恩斯的所谓拉上需求，实际上也是先拉上供给，以增加投资和扩大就业为先，以此拉上投资品和消费品的需求为后。国有资本只有在技术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优化供给，不断推出价廉物美的新产品取悦消费者，才能扩大需求。伪劣旧商品的供给是无效供给，只会抑制需求。

国有资本如何经营才会成功，企业家最懂得盘算。企业家的经营能力、管理水平、用人之道、捕捉机遇、营销技巧、市场经验、公关门道等等，都比任何经济学家高明得多。因此，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要去说教企业家如何运用资本和如何经营管理资本，而是要为企业和企业家争取必要的市场环境、政策资源和伸展空间，解除一切有碍盈利的障碍，帮助摆好国有资本经营中的企业、企业家、职工的位置。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以后，本来单性的国有经济就变为复性的混合经济。公司姓资姓社，只对控股者有意义，对广大普通股东来说已不重要，重要的和关心的是能不能给他们的股票增值和带来红利。他们的股票就是选票，总是从效益差的公司撤出投向效益好的公司，情在利不在姓。国家控股的企业经营不好，股民就会分崩离析，另觅新主。国有企业要有盈利，必须采取公有私营方式，即国有企业采取私有企业一样的经营方式。投资主体可以不同，有公有私有之分，但经营方式必须相同，因为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在同一市场竞争中，是没有投资者性别上的优惠与歧视的。就像同一个足球场上不同球队比赛一样，只能通行同一的比赛规则。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球队就君子气十足，就只能是输家。市场化经营是奉行平等竞争原则的经营，国有私营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市场经营中的唯一选择，舍此无有生路。国有企业问题的症结之一上下都说是领导班子是关键。可是令人大感不解的是，企业领导历届都是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核遴选的，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存在班子问题呢？我们的企业领导一身党政干部气质，难以进入企业家角

色。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该是国有资本的化身，不应当是戴乌纱帽的官员，为此必须而且也只能主要由经济利益来驱使他们的思维与行为。对他们实行动机与效果一致的原则，用好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让企业家在勋章与十字架之间拼搏，成功者高薪激励，失败者淘汰出局。诚然，企业财富是广大职工创造的，但是，这不应该是否定高薪的理由。效益好的企业，财富是职工创造的，效益差的企业，亏损是谁创造的？职工的劳动能不能形成财富，决定因素是企业管理者。决策失误，管理不善，职工只能白辛苦。高薪意味着给企业家工作的高负荷、高责任，不能看做是一种特权与享受。高薪实质上是向能人买企业效益。任何时候提倡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也能搞好一些企业，出一批先进典型，但不能以此包摄全部。离开经济利益搞经济，就没有经济。中国工人有双重地位，即是国家主人，又是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只能由市场配置。因为经济发展存在景气循环，社会主义国家也只能实行景气就业政策。劳动力作为商品买卖，不影响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因为劳动力只是工人的一种劳动能力，并不等于工人自身。企业、企业家、职工的位置以国有资本增殖需要来定，凡不利国有资本增殖的位置都不是正当的自然的位置。

三

社会主义国有资本是新生事物，刚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襁褓进入市场，力量和经验都嫩弱，需要国家宏观指导。但国家的宏观指导，不是要实行指令性计划，也不是要照袭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富有创新意义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是很科学的，正确反映了国家、企业、市场三者关系。其精要之处，在于国家与企业之间介入市场，使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分开，不直接发生关系。两者由市场纽带联系起来。国家调控通过市场发生作用，再由市场传导给企业，引导企业。现阶段，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要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发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当好微观主体瞭望机作用，使微观经济主体这架长机能作战胜利。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变过来的，并非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然发展过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异端性区别，必定会使这种转变遇到比从母体里分娩还要大的困难。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为割断计划经济盘根错节的顽固纠缠，更应放手搞活微观经济让其自由发展，并予以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力不发达阶段，应该引导国有资本首先保证投向物质生产部门，为社会创造丰富的物质产品，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交通、高科技部门，尽可能退出饮食、旅游、娱乐这类服务部门。物质生产毕竟是最基础的，第一重要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达了，第三产业才能发达起来，才能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地区配置上，当前主要不是加大国有资本在落后地区的投入份额，而是加大国家财政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发展交通，改善投资环境，使内地成为准沿海地区。任何地区的发展都不能背离市场经济原则，只有投资回报率高、市场需要开发，才会发达起来。世界上发达地区几乎都是沿江沿海地区，这是经济地理造成的地理经济。中央对财政投入倾斜内地的同时，也要坚守投资回报率高的沿海地区。如果为缩小地区差距，就不坚守或减弱对沿海地区的关注，就等于将沿海地区拱手让给外商与私营企业家投资，国有资本放弃肥肉去三线啃骨头。国有资本没有效益就不能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也就影响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差距还会扩大，沿海成为外商投资为主的繁荣区，内地成为国有资本投资为主的落后区。真正要缩小地区差距，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中央

财政支持发展内地交通，另一条是加大国有资本在沿海地区的经营力量。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为了缩小差距先加大差距是必要的。如果沿海象台湾、香港地区那样发达，必定会有大量资金涌向内地，就象现在台资港资投到大陆来一样。

对外关系上，国有资本经营需要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而世界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两种不同主体的市场经济必然有矛盾，而且两者的矛盾一定比同种主体市场经济的矛盾要尖锐些。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在形成过程中，总量小，机制弱，特别是国有资本还未上高效运行轨道。因此，今后相当时期内需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保护。世界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同一水平化，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仍然起作用。既有差距就有矛盾和冲突。强国财大气粗，咄咄逼人，要主导世界潮流；弱国大义凛然，软硬不吃，要自卫主权与尊严，构置以公平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而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只能是强者的理想国，决不是弱者的欢乐园。发达国家往往相互间为自身利益不厌其烦地角力，而不重视不发达地区的议题。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实际谈判了7年多，足以说明经济全球化绝对不是利益同等化，并没有减少矛盾。国际经济关系就象24K金那么纯的完全是利益关系，每个国家都为自身利益权衡国际关系。这至少在目前还是铁律。中国1986年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仍然被拒在世界贸易组织大门之外，能进是胜利，不进也未必是坏事，暂不进可能更好。中国是12亿多人口的人口大国，发展空间大，是世界上最具有前途的发展中国家，凭自己的巨大消费市场，就不怕经济大国的压力。频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说明今天世界经济连体的格局必定是有福不同享、有祸要同当的格局。过去的关贸总协定和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解除了成员国的关税壁垒。当一个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时，唯一可使用的调节大机制就是调节汇率。汇率一降低，就影响经济连体国的利益，也只好跟着降低汇率，否则要代人受过。这便是一个象墨西哥、泰国这样的小国发生金融危机也会迅速引起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加上现在世界科技发展快，各国都特别注重赶超型的经济增长率，而需求并没有迅速跟上，泡沫经济带有世界性，极容易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世界震荡。

鉴于现阶段国内国际状况，中国对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时日要审时度势再加斟酌。能加入即加入，不加入也罢，不必多申请。与其现在加入，不如将来加入；与其申请加入，不如来请加入。凭自己的优势尽可从容不迫，不慌不忙，迟早不妨，不亢不卑，自主内外。在未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可以保持现在甚至更大的开放度，但关税自主，可以实行随机关税制。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总体上可以因时制宜，随机变动，局部上可以有升有降。对消费品开中门限进，对高科技开发必需的设备和专利，要不惜代表开大门引进。再过一二十年中国更强大了，你不申请都要来请你进了。

国有资产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国内外情势实行资本化经营，中国的公有制主体经济就会有21世纪的辉煌。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邮 编：361005